

G408-25.

。供批判“四人帮”参考。

张春桥早就是地道的投降派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张春桥早就是地道的投降派

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，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上的《星期文坛》抛出了题为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的反动文章，矛头直指鲁迅先生。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中大肆鼓吹“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”，并且提出“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，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！”这就是发动对鲁迅的围攻，来执行他们“国防文学”的路线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鲁迅写了《三月的租界》（见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）一文，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，辛辣地讽刺了根本没去过东北而“留在租界上”的张春桥，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“却知道不够真实”。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如果在还有‘我们’和‘他们’的文坛上，一味自责以显其‘正确’或公平，那其实是在向‘他们’献媚或替‘他们’缴械”。这里鲁迅所说的“我们”是指当时的进步作家，“他们”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。鲁迅文章中还提到“我们中的他们”，指的就是革命阵营中的蛀虫。

这是四十年前的一桩公案。当时周扬等四条汉子配合国民党反革命的“文化围剿”，打起“国防文学”的黑旗，围攻鲁迅。鲁迅

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鲁迅致王冶秋同志的信中说：“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，喊国防文学，我鉴于前车，没有加入，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，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”，“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”，一篇就是《三月的租界》，另一篇是《〈出关〉的“关”》（见《且介亭杂文末篇》）。在四十年前的这场斗争中，张春桥是王明路线的走卒，和陈伯达、周扬等四条汉子是一丘之貉，是围攻鲁迅的凶恶打手。张春桥的这篇反动文章充分暴露了他向国民党反动派“献媚”，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丑恶嘴脸，说明他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宋江式的投降派。

现将张春桥写的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和鲁迅批评他的文章《三月的租界》一并印出，供批判张春桥用。

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

狄 克

自我批判之于我们，犹如空气、水一样的需要。

——约瑟夫——

我们需要批评家，理论家来帮助读者，作者。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，作家们就喊着什么“圈子”啦，“尺度”啦的，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，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：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，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。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，不过已经好了些。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。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！

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。批判了苏汶底理论，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。但是，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，甚至就没有作，也是没法否认的事。

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，八月的乡村，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，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？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，八月的乡村，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，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？不会吧？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？也未必

吧！或者说：为了要鼓励作者，对于他们严厉的批评，是不合适的。或者说：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。然而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！

是的，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，我们应当加以鼓励，应当加以慰勉，然而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，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，甚至他正迫切需要。如果只是鼓励，只是慰勉，而忘记了执行批评，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。我不必举远例，头些时候青年诗人×××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，大家忘了批评他，如何呢？他没落下去了！再看雷雨作者底单行本序文，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；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。他已经在自傲了！假如果他底雷雨发表以后，就得到正确的批评，那是不会有这现象的。

“八月的乡村”“生死场”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？

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，他是一首史诗。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，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，有人这样对我说：“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”，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，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，这部作品当更好。技巧上，内容上，都有许多问题在，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？

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，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：

（一）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别外一部，（二）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，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（三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，而得到良好的结果。

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，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，因为读者需要！

批评家！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！多教养作者

吧！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！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！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，首先我（要）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！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，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！更为了使作家健康，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判！

（抄自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《大晚报》
上《火炬》星期文坛栏）

三月的租界

原载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

今年一月，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，题目是《大连丸上》，记着一年多以前，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——

“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，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。

“‘啊！祖国！’

“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！”

他们的回“祖国”，如果是做随员，当然没有人会说话，如果是剿匪，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，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《八月的乡村》。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。那么，且慢“从冻结里蠕活过来”罢。三月里，就“有人”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——

“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！”

谁说的呢？就是“有人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《八月的乡村》“里面有些还不真实”。然而我的传话是“真实”的。有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的奇怪毫光之一，《星期文坛》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——

“《八月的乡村》整个地说，他是一首史诗，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，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。有人这样对我说：‘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’，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，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，这部作品当更好。技巧上，内容上，都有许多问题在，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？”

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。假如“有人”说，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，否则，他的作品当更好；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，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。倘使有谁去争论，那么，这人一定是低能儿。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，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，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“丰富了自己”，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。

这样的時候，人是很容易性急的。例如罢，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，却“不够真实”，狄克先生一听到“有人”的话，立刻同意，责别人不来指出“许多问题”了，也等不及“丰富了自己以后”，再来做“正确的批评”。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，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，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。可惜的是这么一来，田军也就没有什么“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”的错处了。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。

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，要知道“真实”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，这位“有人”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，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，在东北学习，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。而且要作家进步，也无须靠“正确”的批评，因为在没有人指出《八月的乡村》的技巧上，内容上的“许多问题”以前，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：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，或预备写比《八月的乡

村》更好的作品，因为读者需要！”

到这里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，或将要来了，不妨先折断了投枪。

到这里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，是：“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”。

题目很有劲。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“自我批判”，但却实行着抹杀《八月的乡村》的“自我批判”的任务的，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“自我批判”发表时，这才解除它的任务，而《八月的乡村》也许再有些生机。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，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，列举还有条款，含糊的指摘，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。

自然，狄克先生的“要执行自我批判”是好心，因为“那些作家是我们底”的缘故。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“我们”之外的“他们”，也不可专对“我们”之中的“他们”。要批判，就得彼此都给批判，美恶一并指出。如果在还有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文坛上，一味自责以显其“正确”或公平，那其实是在向“他们”献媚或替“他们”缴械。

四月十六日。

（注：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三六年写的）